

古画迷踪

勋章辉煌

古画无语

藏罪恶

血泪仇



古画迷踪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

书画函授大学

函授部

函授部



〔德〕恩格曼 孙伟译

古画迷踪

漓江出版社

古 画 迷 踪

〔德〕恩格曼 著

孙 伟 译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159-1号)

邮政编码: 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4.875 插页2 字数94,000

1991年7月第1版 1991年7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7800 册

ISBN 7-5407-0710-0/I·503

定价: 2.05 元

一封纽约来信

……我满怀兴趣地拜读了您的书稿，现将书稿奉还。我受事务所的委托，感谢您能在付印之前交给我们审阅。我还受托为您证明，公平如实和毫无隐瞒地讲，您所援引的所有文件都是真实的，由一位专家审查了这些文件，证明确凿无误。您正确地引用了所有这些文件，我们没有什么异议。

就我们这方面来说，对您在调查中揭露某些证据确凿的人的身份没有异议。鉴于有关人士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现代史上的知名人士，而他们既非我们的当事人，又没有因为通常的原因要求我们缄口不语，因此，我们认为不能阻止您给有关人士冠以真实姓名。但我们拒绝为我们以及我们的当事人承担任何责任，谨提请您注意，我们与可能产生的后果无关。我们满意地注意到，跟我们有关的人士的履历与身份您已作了改变，使之不致暴露。我们还想向您强调指出，我们不能容许暴露这些人士的身份，即使将来也不容许。

请您谅解这些必要的声明。鉴于此案有重大的政治意

义——而且也正是由于考虑到不久前联邦总理维利·勃兰特已经下台——我们希望而且必须避免，让我们、我们的当事人或我们的合作者卷入这件事当中。我们也想乘机会通知您，关于建立和资助一个国际政治机构一事，我们已放弃了该项计划。

谨对您的盛意再次致谢。

您诚挚的朋友……

6月24日于纽约

现将信中涉及的书稿全文附于此信之后，付印时没有再加修订。

目 录

一封纽约来信·····	(1)
1 寻人：大卫·弗里德利希·····	(1)
2 彻底而过分深入的调查·····	(18)
3 一个优秀企业家的模范经历·····	(40)
4 古老的海德堡·····	(63)
5 夜航——果子里藏了什么？·····	(88)
6 一百五十万美元的误会·····	(110)
7 建立了一个研究所·····	(142)

1 寻人：大卫·弗里德利希

“……愿您对此次旅行感到满意。”空中小姐结束了播音。从纽约飞来的班机正准备着陆。中欧标准时间9点25分，班机缓缓滑行到慕尼黑里姆机场的候机楼前，连接舷梯的舱门打开了。

律师唐纳德·克雷顿·哈特涅，二十七岁，是乘客中第一个离开飞机的。别人很可能把这个身材颀长、宽肩膀、一头蓬松金发的青年人当成职业网球运动员，至少头一眼看上去是这样；随后，或许会猜测他是一所英国大学棒球队的队长。哈特涅几个月之前确实担任过这一职务，不过不是在英国的大学，而是在美国东海岸一所仍保持着英国传统和习惯的大学里。但现在，他已作为新手加入了有名气的律师事务所，受托于昨晚踏上了来欧洲的旅程。

作为马萨诸塞州有良好教养的新英格兰^①人，他在波士顿上了中小学，在大学当班长时曾以出色的举止和礼貌而著称。本来，哈特涅下飞机时肯定会让他在头等舱的邻

^① 美国东北部六个州的总称。

座，一个三十岁出头、非常漂亮的慕尼黑少妇先走。可是那位女士还在忙着收拾行李，于是他只好匆匆向她道别了。昨晚，从纽约起飞后不久，他就和她攀谈起来。她的英语相当好，声音很悦耳，与她交谈可以在旅途中舒舒服服而又无拘无束地消磨时光，所以哈特涅晚饭后曾邀她喝一杯。这一友好表示显然被她误解了，因为此后不久，她便把戴着戒指的手漫不经心地搁到他的手上，笑着问道：

“您在慕尼黑要呆几天吧？一起去逛逛施瓦本怎么样？或者去山里旅游一趟？我在施利尔湖畔有一幢舒适的住宅，我丈夫出差了，直到这个月底都不在家——我们在西班牙南部新建了一个分厂……”

哈特涅以彬彬有礼的遗憾口吻说明他有紧急而棘手的公务，婉言辞谢了这一令人惊讶的建议。可是，她却试图以她的社会地位打动他，也许是为了消除她的操之过急给这个青年人造成的印象吧。她一一列举了和她家有交情的国际知名的企业家、银行家和政治家的名字，这使哈特涅听得相当疲劳。他想找个机会以客气的方式摆脱她。这时，他突然想起一件事，因为她提到了一些令人肃然起敬的名字：“……我们是在南非认识他的……或者是在沙赫^①那里？施特劳斯——您肯定知道施特劳斯先生，我们这位最能干的政治家吧？是他介绍我们和弗利克以及梅塞德斯奔驰公司的领导人相识的……”这时，哈特涅一本正经地问她：

① 沙赫，波斯君主的称号。

“啊，您也许知道大卫·弗里德利希吧？”

她回答得非常干脆。

“那当然啦！”她快活地叫道，“弗利克财团的弗里德利希博士！可这人不是叫奥托吗？喏，他经常到我们家来做客。直到不久前，他还是我们业主联合会的主席。施莱尔博士是他的继承人。您等一下……”

她在一本杂志里翻找，那是她的旅游指南，终于找到了一张相片，指给哈特涅看。

“这就是奥托·阿·弗里德利希。我丈夫跟他很熟，弗里德利希博士当凤凰橡胶公司总经理时，就是我们最优秀的橡胶专家。他自然不算年轻了，我估计他是1902年或1903年出生的，是个相当迷人的男子汉，老派的绅士……”

哈特涅没有向他透露，他的弗里德利希先生肯定不叫奥托，而是叫大卫，因此与她赞不绝口的原凤凰公司总经理和业主联合会主席不是同一个人。他的弗里德利希不在弗利克财团担任领导，也不是1902年或1903年出生，而是1774年生于格赖夫斯瓦尔德，1840年死于德累斯顿。他也和橡胶、钢铁或汽车业无缘。他的大卫·弗里德利希其实是个名画家，在他的作品中有许多非常浪漫的、使观赏者感到奇异的、具有宗教色彩的风景画。

哈特涅也是前不久才知道这些情况的，更确切地说是昨天晚上。正是为了这位素不相识的德国画家，他到平时很少光顾的律师事务所图书馆里查阅了二十三卷本的百科全书，这完全是由于他叔父本亚明·阿索尔·克雷顿的一次谈话引起的。

昨天，哈特涅忙了一天，下午5点钟左右要离开事务所回家时，被他的叔父——一个上了点年纪的和气的单身汉和律师事务所的高年资律师叫住了。叔父向他提了个出乎意料的问题：

“你说，明天派你去欧洲给我办点事行吗？案子牵涉到某个德国古代画家的一幅画——我想，他叫弗里德利希……大卫·弗里德利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涉及差不多六百万美元。不过，我决不想让你为难，孩子，假如你明天和这个周末另有计划……”

克雷顿先生以担心的口气说了这些话。因此，他的侄儿连忙保证，他没有什么要紧事，能为叔父效劳是他莫大的荣幸。

“哦，那太好了，孩子，这真叫我高兴，”克雷顿先生说。归根结底，哈特涅得感激叔父，是叔父使他年纪轻轻就进了这家有名望的律师事务所。

“我给你简要介绍一下情况，”叔父接着说，“这可不是件寻常的小案子。这个案子是我们可敬的同行曼德尔施塔姆交办的——我不明白这个苏格兰人为什么会来找我们这家事务所？……嗯，总之，是我多年来的老相识曼德尔施塔姆把这案子交给我们的。那是在一次扶轮社^①会餐时，去年春天。他以为最好由我们承担这件棘手的案子——虽然这纯属犹太事务，他的公司完全有资格管。就这样，我既没多想也没多问，为什么这事最好由我们管而不是他们

① 一个国际性的社团，因在社员的办公处轮流集会，故名。

管……正如我已经说过的，案子毕竟牵涉到差不多六百万美元。你可以把案卷带回家去，仔细研究一番，就会明白为什么明天你得飞往慕尼黑了。”

“去慕尼黑？”哈特涅重复道，立刻联想到宽敞的啤酒馆，大堆的香肠加泡菜，穿皮裤、戴绿帽、哼着小曲、用大杯子喝酒的快活的人们。他很高兴这个案子交给他办，这给他提供了机会去熟悉那个肯定是值得观光的城市。

“对，德国的慕尼黑，在西德，”克雷顿先生确认，并从他那张精致的、对于律师事务所来说显得过于贵重的、路易十六时代的写字台里翻出一封打字函件，皱着眉头细看信笺上端打印的那一长串德国律师的名字。“我们在那儿的尊敬同行——可惜我读不出他的名字。你兴许行，孩子，如果我没弄错的话，你在大学上过德语课。不过，你别担心，”他接着说，“在慕尼黑会有一名翻译由你支配……喏，我要说的是：德国同行和我们商妥了包括手续费在内的固定酬金。当时我们说是一件争议价值只有一百万美元的案子，所以你对他们决不要谈到事关差不多六百万。他们并不亲自处理此事，据他们说，是请一位一流的专家负责，一位叫弗利茨或者弗莱茨的先生……慕尼黑的同事告诉我们，此人卓有成效的调查即将结束——或者说差不多接近结束了。德国同事的信里说，他们目前正面临着困难而重要的抉择，得跟我们面谈——他们是明智的，你也这么感觉吗？”

“当然，叔叔，非常明智。不过，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一切都在案卷里有，孩子。”克雷顿先生答道，“我自然理解你的急切心情——这毕竟是你第一次真正重要而又完全独立的任务，事关重大。好吧，这是件遗产诉讼案。你也能想得到，不然，曼德尔施塔姆就不会把我们当作这方面最合适的行家。更确切地说，是关于马尔库·列文斯基遗产的一部分，他在遗嘱中没有划给列文斯基基金会而是留给他的亲属的那部分……”

“列文斯基……你是指那个家财亿万列文斯基吗？”

克雷顿先生并不理会侄儿的评论，而是继续用柔和的语调说：

“马尔库·列文斯基先生已经去世三年多了，他把所有财产都捐给了一个促进癌症研究的基金会——但是除了五百万美元，他的三个孩子应该继承的五百万美元以外。可是，三个孩子却在一起乘滑翔机飞行时失事身亡，而且是在父亲死前三天——这真是一件极为悲惨的事，然而父亲却不知道。他已经不省人事，最糟糕的是他连遗嘱都没能再修改……”

“那么，他的遗孀呢？”哈特涅问。

“列文斯基太太早就过世了——生小儿子的时候难产，她也没有其他亲属……遗憾的是，这一切当时都登报了。说什么有“五百万美元无人继承”，很可能连同列文斯基故居一起归新泽西州所有……这样，不出所料，马上就有一大堆人申报，声称与老列文斯基有这种或那种形式的远亲关系。既然他的亲生子女全都先于父亲死亡，他们便有权继承这百万家财。”

“其中一位大概就是我们的当事人吧？”哈特涅问，显得毫无热情。

克雷顿先生摇摇头。“不，孩子，当然不是，因为我们只接受绝对可靠的委托。我们的当事人是一位大卫·西利希曼先生，家住加拿大的魁北克省，名声很好。他是八个月以后才申报的。他并不说自己是列文斯基百万家财的唯一继承人。相反，他请我们的同行曼德尔施塔姆，进而请我们，对他的权利进行一次认真细致和不带偏见的审查。西利希曼先生的母亲出生在列文斯基家，据说她和家人一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害于波兰——这事我们的当事人还记得，对此我们没有理由怀疑。他母亲在纽约有个很有钱的哥哥。他说，1939年8月底，战争眼看就要爆发的时候，父母亲在困境中曾向这个舅舅求援，请求马尔库·列文斯基设法让他妹妹全家，也就是西利希曼一家，尽快逃离危险的波兰，迁居美国——由他进行担保，并且用美元支付他们赴纽约所需的路费。”

“西利希曼一家的请求实现了吗？”

“看怎么说了。那是一次绝望的尝试。起先，他们对得到马尔库·列文斯基的回复并不抱多大希望。西利希曼太太，也就是当事人的母亲，最后一次见到哥哥马尔库时还是个孩子。当时是1913年或1914年，这个十八九岁的哥哥与父母亲发生激烈争吵后离家出走了，许多年以后他才从纽约来信，告诉家里，他混得不错，成了个小有成就的男子汉。当时尚在世的父亲连信都不回，他对这个‘逆子’恨极了。父亲觉得，儿子逃避服兵役，给家庭带来了耻辱。

在以后的年月里，一直到1939年8月，在美国发了财的浪子和他留在波兰的亲人之间便再也没有联系。尽管如此，马尔库·列文斯基还是满足了西利希曼一家的请求。他很快就寄出了经过公证的担保书，当时移居美国的签证非要担保不可。还有一张同样经过公证的支票，其数额足够西利希曼一家的旅费，另附一纸通知，指示美国驻华沙大使馆的领事处立即发给签证，协助西利希曼一家离开波兰。但是，这次营救努力毕竟太迟了：1939年9月，当马尔库·列文斯基的信送到西利希曼家时，波兰共和国已不复存在，主管签证的美国驻华沙大使馆也没有了。国家已被德军占领，西利希曼家所在的小城——它的名字很不好读，位于克拉科夫西南不远——已被希特勒断然宣布为德意志国的一部分。西利希曼一家此时已不能再向任何中立国的代表机构求援。作为德意志国的犹太人，他们已不受任何保护，成了毫无政治权利的人。他们不得不迁出舒适的别墅，把一切东西都留下。而原来，他们一直是家境富裕的人。当事人的父亲在一家大炼油厂担任领导，那是该地区最重要的企业。”

“他们把担保书和汇票也留下啦？”哈特涅问。

叔叔笑了。“看来，你已经认识到这些文件对证明继承权有何意义了。”他说，“当然，他们可以把这些珍贵的文件存放到秘密的地点，可以藏在他们的衣服里。但当事人的父亲是个聪明人，是个出色的棋手，惯于事先多想几着棋，认为这样做不保险。他知道——或至少是预感到——他们作为犹太人面临着种种倒霉事：刁难、虐待、强制劳

动、集中营，也许还有死亡……他预料到如下情况：把东西藏在身上，那么头一次彻底搜查就会被发现，然后东西便会永无下落。再说，担保书和支票暂时也用不上。我们的机会在于我们，或者我们当中的某几个人——熬过战争和纳粹统治的年代，然后再利用这些文件。因此，需要将它们妥善藏好，以后再找出来……这就是他的考虑，他想到了——一幅珍贵的油画，那是他的祖父，一个很有钱又有学问的老先生传下来的。他把文件卷紧，塞到画框和画布的背面之间，然后上面再贴一条胶布，又细心地撒上灰尘，使之毫不显眼，然后再把画挂回原来的位置。他给妻子儿女——也包括他的小儿子，即我们的当事人——看了藏文件的地方，嘱咐他们记住这幅画——西里西亚山区的风景画，前景是一座废墟，记住画家的姓名是大卫·弗里德利希……”

“我真不明白，古画可是很容易被盗的！”

“不错，西利希曼先生正是考虑了这一点。他寻思：一幅珍贵的油画即使被劫，也很可能在别处重新出现。因为和其他大多数东西相反，这种艺术珍品一般总是局限在少数懂行的商人和收藏家的小圈子里。画总是可以鉴定的，并且被登记造册，不会丧失其价值。它不会改变，也不会以假名字进行交易——你明白了吗？”

哈特涅点点头。

他对故世已三十多年的老西利希曼满怀敬意。同时，他也很乐意促使这个聪明的主意赢得虽然姗姗来迟却更显得伟大的成功。

“那么，咱们在德国所委托的人已经发现了油画的踪迹吧？”他说，“当事人希望，借助这些文件——只要它们仍藏在原处——证明他与已故富翁马尔库·列文斯基的亲属关系，从而提出继承遗产的要求……难道就没有其他办法提供血亲关系的证据了吗？除了当事人以外，还有谁可能是继承人吗？”

克雷顿先生叹了口气。他解释道：“关于你的第一个问题，回答是个明确的‘不’字——当事人没有其他文件能够证明他是已故马尔库·列文斯基的外甥。大卫·西利希曼从小就被寄养到克拉科夫一个和他父母有交情的天主教家庭里，假称是那一家人的儿子。因此，他躲过了对犹太人的迫害，但他的所有证件都被毁掉了，包括战前的官方登记表，无论在波兰的地方当局还是在他家所属的犹太教区都找不到。1945年初，当事人及其养父母从克拉科夫回到过去他家居住的小城，西利希曼家的别墅已荡然无存，那幅画也消失得无影无踪。他的父母亲和兄弟姐妹都不在人世了……不久后，1946年，大卫·西利希曼恢复了他的真名实姓，依靠联合国的帮助离开了波兰。他去了加拿大，在那里读书，成了建筑师。前面讲过， he 现在是魁北克省受人尊敬的家境富裕的公民……”

“那好，”哈特涅说，“我们需要的是藏在大卫·弗里德利希油画画框里面的文件，证明大卫·西利希曼是已故马尔库·列文斯基的外甥，因而也就是他的继承人。但是，又怎么证明再也没有其他继承人了呢？马尔库·列文斯基除了西利希曼太太外也许还有其他弟妹……”